

# 参 考 信 息

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主办      第 3 期      (总 157 期)      2014 年 3 月 20 日

---

## 高等教育改革系列二

### ——国内形势分析

**编者按：**2012年5月16日刘延东撰文，强调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重要方针。首先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这不仅是世界各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只有一个多世纪时间，从晚清到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前行，形成了许多好的传统和风气，即使在内忧外患的抗战时期，高等教育仍然向前发展，涌现了一批名家大师，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次，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提高高校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形成相互支撑、整体提升质量的格局。三要改革创新、加强领导，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为此，我们选编部分材料，供领导和相关部门参考。

### 目 录

1. 高教改革：应提倡“双重标准”和“流动性” ..... (2)
2. “科教融合”是高教改革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 (6)
3. 西南联合大学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之启示.....(10)

## 高教改革：应提倡“双重标准”和“流动性”

就高考招生、大学教育改革等热点话题，《社会观察》的记者专访了在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学习和研究三十余年的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

### （一）中国要走出考试万能的误区

**记者：**谈到教育公平性问题，你认为欧洲最好，美国次之，中国最差，此话怎讲？

**陈平：**虽然我在很多方面批评美国，但在教育上我认为中国是要严厉批评的。中国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很大，但是中国教育的多样性和流动性问题更大。过度强调高考的公平性，忽视教育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必然牺牲教育的创造性。历来企业家、科学家和军事家都不是考出来的，而是实践中磨练出来的。因材施教的原则，不是单靠“一考定终身”能够解决的。

近些年，中国教育的质量有飞速的发展，但是从学生教育机会均等的角度来谈，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做得比较差，不如美国，更不及欧洲法德等国家。原因是教育的公平是和政府的税收及财政政策相关的。

穷困学生拿到奖学金、获得补助的机会比例，美国要比中国多。以得克萨斯大学为例，得州法律规定，高中学生毕业成绩排在所在中学的前8%-10%，只要申请州立大学就自动录取，这就保证贫困地区的优秀学生也有同等概率入学。其他学生的录取参考两种全国性考试SAT和ACT的成绩，在某个分数线以上，再参考学生的多样才能、领导力和社会服务等综合能力。这就兼顾统一考试的分数线和学生的多样才能。优秀学生学校会主动上门提供全额奖学金。一般公立学校的学费，每年1万-3万美元，私立大学3万-5万美元。得克萨斯大学学生得到资助的比例约50%，麻省理工学院学生资助比例约60%。

资助形式按家庭经济状况包括无须偿还的奖学金，半工半读的工资，和毕业后开始归还的由政府资助的学生低利息贷款。原则上，优秀学生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不能入学。美国的金融危机使美国大学学费增加，而政府补贴学生贷款的能力降低。法律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分期归还学生贷款，而且不允许用破产的办法逃避学生贷款的债务，这就降低了美国年轻人上大学的动机。美国不得不放宽移民法从国外引进技术人才。

中国没有家庭普遍报税制度，使中国对贫困学生的公平资助缺乏财务制度的基础。报纸上宣传的对贫困生的捐助，事实上反映的是教育资助体制的落后。

中国农村和内地上大学的分数线反而比沿海大城市还高，这是中国高考制度最不公平的地方。其次，中国的高考试题偏向城市学生的文化标准，而非农村学生的实际生活能力，这是隐形的高考不公。

美国大学招生是“双重标准”，除了SAT / ACT成绩以及高中阶段的成绩，还要看社会活动经历，比如学生各种特长、社区服务活动等等。当然最后一条事实上对穷人不公平的，因为有钱人家的孩子有更多机会参与这些活动。对美国中产阶层的子女而言，他们不需要像中国那样上补习班应付高考。家长宁愿支持子女去参加体育、音乐和科技的社团活动，或者服务社区，在申请的个人简历上表现个性、领导力和创造才能，比单纯的高分更有机会上名牌大学。

德法等欧洲的教育公平性更好。德法的公立大学一直都是免学费或低学费。代价是政府财政的负担很重，同时优秀教授被美国的高薪挖走，尖子学生都跑到美国去读研究生。讨论教育的公平，离不开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为谁服务的大问题。中国高校招生的公平性确实不高，但是中国教育的真实社会差距，要比多数发展中国家小。

**记者：**中国政府曾经强调，不让一个贫困孩子上不起学，大学里也提供奖学金、学费减免、低息贷款等。

**陈平：**当然中国政府也在努力，但是还远远不够。中国的现状是穷孩子可能上得起中专、技校，但是上不起大学。我60年代上中国科大的时候，一半以上是工农子弟。90年代起到

北大教书，我估计工农子弟30%都不到。即便是从农村来的，父母亲也可能是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或者家庭条件好的农民企业家。我碰到过极为优秀的农村贫困子弟，即使读到硕士，也不得不放弃读博士。现在大学里的工农子弟比例就更低了。原因是大学里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奖助学金的比例仍然非常低，还要靠民间资助社会捐款。美国本身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就高，私立学校的奖学金更是名目繁多。

## （二）政府投入少导致教育不公

**记者：**高校里面工农穷人子弟比例越来越少，你认为这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贫富差距太大导致的，因为学费是最大的门槛，很多穷人家的孩子，没到高考阶段，就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早早参加工作了？

**陈平：**不是贫富差距的原因。判断贫富差距的简单标准是社会秩序。白天你是否敢到贫民区走路，女孩子晚上敢不敢出门到市中心去。在中国，你们应该感到幸福，即便是在二、三线城市，治安都很好。因为贫富差距没那么大。比中国好的只有北欧国家和德国。关键原因在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比例太低，甚至比不上印度，这是个失误。

曾经有人说，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了，学费应该更高一点，拿出80%来设立奖学金，资助穷人家的孩子上学。这句话后半部分是对的。

在中国上学的机会是不是平等，主要看家庭经济能力。政府投入少，加上物价上涨原因，这些年中国大学的学费涨幅很快，2000年当时大学的学费4000-5000元/年，现在本科生1万元/年。学校的各种费用也在涨，学校没钱怎么办，只能卖双学位，办各种培训班，变相收钱。却没有变相给穷人的孩子设奖学金，鼓励他们上学。其实最终结果是贫者愈贫。

中国教育经费的拨款一直落后于基础建设和医疗养老的拨款，这就增加了年轻人求学和就业的困难。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领先于发达国家，但是教育投资落后于发达国家和某些新兴国家。应该做结构和体制上的大力调整。还有一个问题是，资源分配太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倾斜。大城市的房价差别，基本反映的是教育机会的差别。北京上海的高考分数线低，所以新富阶层纷纷到北京上海买房，实质是买子女高考的户口。中国富人移居海外，很多人也是考虑子女上大学的机会。

## （三）鼓励高校学生和教师自由流动

**记者：**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不少，但在中国当前的背景下，高考相对来说，仍然属于比较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这些年开始探索高教改革，在一些大学推行自主招生，但也遭到一些批评，认为可能滋生新的腐败，出现寻租。

**陈平：**自主招生的改革很难全国推行，因为没有有一个办法能一劳永逸解决招生的公平和客观问题。真正检验人才的办法，不是考试，而是竞争。中国的高考表面竞争激烈，问题是“一考定终身”。进入大学以后，淘汰率非常低，教师的流动性也非常低。滥竽充数的人太多，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大学的竞争力。

我在北大招研究生，保送的学生和夏令营自主招生的学生，多半创新能力高于研究生考试录取的高分学生。

我们的体育运动，在国际上拿了很多金牌，都是靠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不是考试考出来的。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却发现不了人才。中国有独立才能的学生，他们进入西方名校的概率，可能比进入中国名牌大学的概率为高，不是说明西方大学的基础教育比中国好，而是西方招生的灵活性比中国高。

为什么不学习1917年的蔡元培，不拘一格选人才？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创新人才冒出来，因为美国有一句名言，就是Nothings impossible in America(美国一切皆有可能)！因为所有的学校规章都是按普通学生的水准设计的。他们只要发现天才学生，什么规则都可以绕过去，只要有大牌教授或系主任敢承担责任。

我们国内喜欢讨论教育招生的腐败等等，这些在美国并不重要。美国不怕开后门，关

键是进来之后，没有能力的，在强者竞争下会自动出局。即使名牌大学毕业，找工作的待遇，也未必高过当地的大学。所以，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如此关注高考的公平性和上名牌大学的机会。

美国大学的好坏取决于竞争性和流动性。中国大学只有入学的竞争性，入学后缺乏流动性。美国好的大学毕业淘汰率在15%到20%左右。实际淘汰率更高。因为各校都有一个试读期，让你自主退出，不留下不及格的不良记录。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学可以在教授和系一级自主招生，没有什么“开后门”的嫌疑。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制度。它的竞争激烈是有名的，每年都有学生自杀。第一年学生的各科考试，三分之一左右的学生不及格。但是，麻省理工学院规定，第一年的成绩可以不记在学籍中，给不同背景的学生一个缓冲期。觉得无法适应的学生可以转学到其他学校和系科。留下的学生从二年级开始进入严格的淘汰赛。

得克萨斯大学是每学期头两周给学生自由退课和转学的机会，两周以后开始淘汰赛。这样，能力不够的学生，进得了好学校，未必能在好学校坚持住。

钱学森在1962年就主张，科学教育要有淘汰制度。但我们中国的教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荒唐的是，把竞争起点设在小学甚至幼儿园。我外孙在上海上小学一年级，他才6岁，每天吃完晚饭，做中文、英文和数学作业要做到晚上9-10点，简直疯了！国内所有的学校都在比赛。老师的奖金和升学率挂钩，学校如何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

中国的大学教员也没有流动性，开设的课程起码三分之一内容过时或者不必要。结果中国大学生的学时负担比美国高一倍以上；许多学生不认真上课，只是考试混学分。即便有才能的学生，也只是在最后一年临毕业找出路了，才真心思考问题。国外好的大学，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要思考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了。

**记者：**你在北大招研究生，没尝试淘汰制么？

**陈平：**北大考试通常淘汰5%，实际上的淘汰率低得多。可是淘汰率越低，被淘汰的学生心理压力越大。美国考试淘汰15%-30%，学生习以为常，宽松的老师名声反而下降。中国只淘汰1%-5%，学生就威胁要自杀，老师只好让大家都及格，最多抓几个作弊的学生交账。结果严格执教的老师反而学生少。

我的办法不是淘汰，而是选优。只要来上课的学生，基本都能及格。但是要得优，成绩只占一半。另一半靠竞争性研究。只有表现出创造性的前三名学生，我才给推荐信。所以，学生上我的课是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最好的学生是慕名而来的旁听生，就和当年的华罗庚一样，发现人才，我就设法保送他去念研究生，在学生时代就去冲击世界前沿，结果超过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生。

问题是，北大好老师好学生很多，但是没有几个院系领导敢承担破格录取的政治风险。中国的学校领导不出事比出人才更重要。这是中国高校没有发挥潜力的主要障碍。

#### **（四）去美国读中小学是糟糕的主意**

**记者：**正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有这些问题，很多家长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做准备，要送孩子去美国读中学，从而更容易进美国的大学。

**陈平：**我们很多家长要把未成年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这是很糟糕的主意。上中学期间，孩子的心智还没有成熟，这是很危险的。

美国公立中小学午餐是免费的，穷人表面上得起学，但是美国中小学下午放学很早。法律不许未成年子女单独在家，送孩子到私立的课后服务中心，对穷人而言是不小的负担。我的两个孩子在美国都读的是公立小学和中学。私立大学不但学费很贵，而且风气不好。学生是来比富的，不是比念书的。将来难有自立的精神。

美国社会问题很严重，即便是公立的重点学校，一半左右都是单亲家庭，三分之一学生吸毒。西方的孩子很多生活在支离破碎的家庭，孤独、心理疾病，沉溺于网络世界，乱性、帮派、酗酒、极端个人主义等等问题严重。中国小留学生，如果不和家人共同生活，

在美国学坏的可能远远大于学好的可能。

美国的基础教育非常糟糕。没有基础的教材，没有教学大纲，所以各州各地区的教育差距极大，远远比不上中国普通的中小学。美国人的数学是众所周知的差，人文社会科学就是一个大拼盘。看看《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就能一比高下。美国的教育其实质就是教你做推销员，乔布斯不是什么发明家，就是一个推销员。教育学生怎么包装自己，怎么推销自己，怎么把“垃圾”卖出去。

西方的大学，只有少数学校有世界一流的教育。例如英国的剑桥、牛津，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以及一些小型的人文学院。它们的长处是鼓励学生文理兼修，从事跨学科研究比中国大学的知识面广。但是，多数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忙于自己做研究，让外国研究生当助教教本科生。所以美国即使好的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不如中国的重点大学。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的学生，到美国研究院竞争，很容易名列前茅。因为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比美国扎实。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读研读博士，还是美国的教育质量要好吧。

**陈平：**一流大学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的研究院的确如此，但是社会科学未必。美国研究生院的研究水平比中国高，因为研究地位比教学高，研究经费比中国高。中国高校的老师们都忙着教书，因为工资按照课时算的，到了晚上才有时间做研究。

美国科研经费的拨款是拨给到学术带头人，不像中国是拨给学校。所以，美国优秀学者的研究经费和国际联系比中国多。美国的科研经费，一半是研究人员的工资，这样不用考虑自己的吃饭问题，一心做研究。中国的问题是科研经费能够用来开会，但是不能付研究人员的工资，做科研的给研究生的工资也付不起。当然最近十年中国的科研经费增加很快。但是，科研经费的管理还是有很多问题。短期行为太多，有远见的资助不够。

国内高校经费的管理还存在一个“包产到户”的怪事，各个院系独立分灶吃饭，没有学校的统筹管理。管理学院的一个秘书比物理系的教授工资还高。最穷的是历史、物理、化学等等这些基础学科，需要资助的学科却没钱。管理学、经济学，越是不成熟的专业越能赚钱。即便是西方的跨国公司，也没有让一个部门承包出去，无限制地发展，不兼顾其他部门的发展。

教育领域的“包产到户”，也是教育市场化的产物，包括大学停止分福利房，年轻教员买不起房，长远下去北京、上海的大学会有老师断代的危险。中国的大学应该学学剑桥的管理体制。

### **（五）好的教育传统应保留**

**记者：**综合各国的经验，你认为中国教育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有哪些改革思路？

**陈平：**中国高等教育要学习美国的几个方面：一、公立大学推行土地赠予制度，遏制学校的创收冲动。公立大学划拨得来的国有土地等其他国有资产，允许其经营和出租，获得的收益用来设立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及优秀学生。政府对于公共用地的拆迁补偿，除了提供面积类似的住房之外，也要投资给我们的下一代，比如给农民工子女设置奖学金，而不是催生一批食利阶层，任由其拿拆迁费去赌博投机。

二、教师和学生要有淘汰制度，要鼓励人才流动。放开重点大学的招生比例，扩大自主招生比例，宽进严出，进来之后试学一年，一年之后不断淘汰。高校教师也实施淘汰制，鼓励流动。对淘汰出来的教师和学生不但不应歧视，还要鼓励他们主动到二、三线城市的学校学习和创业。鼓励均衡发展，而不是都挤在大城市。就如华为、淘宝网这样成功的企业，走的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路线。

三、研究985、211等学校评比的改进和替代办法，代之以对各科学术带头人的成果评比。科研资助直接下到学术带头人而非学校或院系，才能避免大锅饭。要破除对中央直属名牌大学传统领域的资源垄断，鼓励创新学校和创新学科，鼓励地区间和学科间的人才流动。鼓励特色办学，比如数学学校、生物学校、葡萄牙语学校等等。特色学校分别和研究

院、企业或商会建立联系。例如巴西的投资前景很好，但是缺少葡萄牙语的人才，为什么所有的学校都要学英语？

四、中小学学生阴盛阳衰很明显，原因是女教师太多，教出的学生缺乏冒险精神。应该鼓励退休的公职人员、专家教授、企业家和军人到中小学兼职，给孩子们讲社会实践课，讲前人艰苦奋斗的故事，不能只教书本知识或电子游戏。

**记者：**那你认为哪些好的教育传统要继续保留？

**陈平：**大跃进时期，我们都是半工半读的，大约一半时间在上山下乡和学工学军，军训要拼刺刀，实弹射击和战术动作。现在我们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就是死读书，连体育课都不好上了，学校的军训许多是形式主义，对战争和灾害缺乏思想准备和实战训练。

我1962年上的中国科技大学。科大是科学院的科学家亲自讲课，政工干部是志愿军总部的转业干部，下乡劳动就给我们讲战争故事。所以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奋斗精神都很强。

我1980年出国时已经36岁了，到美国世界领先的研究所和20多岁的美国学生竞争，除了语言困难之外，所有的考试都超过美国学生。毕业的总平均是全A的最高分。其他北大清华科大毕业的研究生也都名列前茅。说中国人没有创造性没有理由。现在美国名牌大学录取学生，更看重中国的公立中学，而非国际学校。就是发现中国学生的基础素质高。此外，我们的传统教育，比如少先队、青年团的活动，强调集体主义，这些都对锻炼孩子的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很有好处。

我大女儿出国时已经10岁，在国内学校当过大队长，其间锻炼出来的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后来到跨国公司工作，游刃有余。我二女儿出生在美国，喜欢自由读书，但是缺少组织纪律和团队活动能力，我曾经带她到北大附小念过一学期，中学又去北大参加过大学生的夏令营，交了不少朋友。这些经历对孩子的成长来说，都是很宝贵的。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容易变成美国天下第一的自大狂。到了欧洲才知文化的根基深，到了中国才知发展的空间大。

中国今天的领导人都是上山下乡出来的，不是西方贵族大学出来的，所以，中国的改革比拉美、东欧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的干部和企业家把孩子都送到西方培养，而不到中国的基层锻炼，只怕家业难以继承。

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但是我们的一流大学都在培养留美预备人员。应该是教育改革的时候了，我们很有潜力，完全能够以举国之力，把中国的教育办成世界一流水平。

（摘自：《高教改革：应提倡“双重标准”和“流动性”》社会观察 2013年第7期）

## “科教融合”是高教改革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

### （一）“科教融合”是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体现了科学研究对高等教育的支撑和引领

**赫冀成：**卸任校长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高等教育新的信息了解得少了，看法难免落后于形势。“访谈提纲”中的几个题目都很重要，比如高校科技如何为地方经济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等等。但随着高校科研的发展，高校的科学研究如何做到更加有效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环境氛围，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思考和重视。因此，我就“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如何支撑和引领高等教育”这个话题谈谈看法。

科研与教学的融合是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现代大学形成的历史。1810年，德国创立的第一所新制大学——洪堡大学被称为是“现代大学之母”。洪堡大学对于欧洲和全世界的影响都非常深远。洪堡大学的创立者认为，现代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教学与研究应同时在大学内进行。因此，它从成立起，就确定了教学与研究为一体，

以及全面人文教育的宗旨。在此之前，不论欧洲或美国的大学都还是沿袭修道院的传统，以培养教师、公职人员和贵族为主，比较不重视研究。洪堡大学一改传统大学模式，使科学研究正式登堂入室。此后，洪堡的理念传递至欧、美各地，成为许多大学仿效的对象。可以说，现代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形成自此开始。洪堡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世界学术的中心，产生过29位诺贝尔奖得主，成就惊人。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凡霍夫就出自洪堡大学，还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神学家施莱马赫，法学家萨维尼等都曾在此任教。共产党理论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李卜克内西等都曾就读过洪堡大学，其他还包括欧洲议会主席舒曼、哲学家费尔巴哈、著名诗人海涅、铁血宰相俾斯麦及作家图霍尔斯基等都曾在此就读。洪堡大学的惊人的成就，毋庸置疑地证明了它所开创的现代大学之路的正确性。

洪堡大学开创的现代大学模式的本质在于两点：一是科研与教学并举，并且要教学科研合一；二是进行全面的人文素质教育，即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创新知识，还要注重全面地培养和塑造人的素质和精神。今天，综观世界著名大学无一不是在这个道路上不断发展而来。因此可以说，科研与教学的融合是现代大学的特征之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根本性改革。

**马海泉：**我国高等教育理论是建立在教学、科研“二分法”基础上的，特别强调了教学体系和科研体系的独立性，这符合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近些年来，国家先后启动了“211工程”、“985工程”等以建设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发展策略，其核心就是突出强调提升大学的科研创新能力，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高等教育。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大学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高校创新能力大大提升，但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仍然没有引起大学的足够重视，众多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仍然用传统的“二分法”探索谋划高等教育。这样做，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 **（二）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的人才培养体系是研究型大学的一个本质特征**

**赫冀成：**纵观近30年来我国大学改革和发展，其本质就是一个教学、科研不断融合的过程。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看，落实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无疑是当前大学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30年来，为了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强国梦”，国家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和“2011计划”。共同之处都是明确和突出科学研究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因此，这些战略规划都明确提出了比较多的科研指标，科研项目、科研水平、科研大奖、标志性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也就自然成为大学特别关注的问题，必然推动了大学的学术发展。但是，诸多的评估和发展竞争的现实，使科学研究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学校，都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所以科研越来越被重视，形成了追逐“学术GDP”的现象。而在政策导向上，也使教师对“名利双收”的科研趋之若鹜。因为在我们的教育思想上，科研和教学并重，始终是两条平行线，其因果关系也容易导致出了成果，却冲击了教学，至少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也使教师难以甘于寂寞地潜心教学，难以不忘“本分”倾心“培养”人才，有名师也就不一定能出高徒，“钱学森之问”就难于破解。因此，大学在科研与教学并举的发展中，不仅要研究如何处理好教学科研的关系，更要始终把科研与教学的融合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积极探索如何充分发挥科研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作用，构筑适应研究型大学的培养模式和教学体系，做到既出成果又出人才。

“211工程”、“985工程”和“2011计划”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影响是巨大的。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的人才培养体系正是研究型大学的一个本质特征。良好的科研环境是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必然选择，需要大学从根本上改变对教学、科研关系的思考，逐渐建立起研究型大学的教学体系。大学的本质是育人，大学的灵魂是学术。而在许多情况下，

由于忽略了大学教学、学习的学术本质，使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学体系面临着很多无法破解的难题。在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大学的许多政策都对搞研究学术的有利，导致教师没有更多地思考教学与学习的学术。

**马海泉：**从长远看，改变我国大学科教分离的体制，还必须进一步明确教师根本职责。教师的根本职责首先要教书，否则就不是大学；同时，大学教师还必须有学术水平，使教师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和承担一些社会服务工作提高教学水平，真正体现用高水平的教师来为教育主体负责。

**赫冀成：**是这样的。一流大学的本质就是教学和科研相融合。从教师的职能看，教师无论重视教学还是重视科研都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如何引导教师的科学研究以什么形式直接、间接地用在人才培养上？建国初期，中国大学全面学苏联体制，一个特点是大学基本上都是教学性大学。国家层面教育、科技分工明确，只有顶尖大学有很少一点的科研，大学的基层组织叫教研室，本来就应有教学和研究的内涵，也单纯被理解成教学研究室。这种体制特别不适应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反复强调大学的基层组织应朝着教学科研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仍然使教师容易形成重视研究而忽视了教学。

重建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必须充分理解科教融合的内涵，按照研究方向、研究领域重新组合，将教师科研中一些新成果、新体会融合到课程中去培养人。基层组织是大学的基因。教学和科研融合型的基因才是研究型大学应有的健康基因。通过基层学术组织改革，大学就能将培养的学生置身于在科研的环境下进行知识传授，使学生不仅接受了知识，还能接受到科学研究的训练和这所大学的学术氛围。科研的气氛是抓不着，摸不着的，但是你在高水平大学里一天到晚感觉的都是浓浓的科研气氛。因此，中国大学说什么也要实现真正意义的科教融合。

**马海泉：**衡量一流大学培养学生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培养的学生要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增强大学的科研能力，也包括提高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使学生在一种研究浓厚的氛围中学习。

**赫冀成：**中国大学科教分离状况既有学校的问题，也有政府的责任，更多的人归结为体制的问题。我认为，科教分离的根本原因是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的问题。大学在科教二分的教育思想观念下，肯定不会产生出科教融合的体制机制来。

“科教融合”才能使大学办出特色。无论“211”、“985”高校还是地方高校，大学只搞教学不搞研究不行，只搞研究不搞教学也不行，而如果大学的研究起不到支撑和引领人才培养的作用则更加不行。事实上，大学的教师团队的结构决定了一所学校的办学类型和方向，大学的分类反映了办学目标不同，更反映了教师科研类型的不同，大学教师的科研类型和水平决定着这所学校发展的方向和人才培养类型。近年来，一大批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在服务地方经济和区域发展中办出特色和水平，展现了突出的办学特色。这类学校的科研和教学与“985”、“211”大学有很大差别，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才培养目标上的不同。各类大学科研水平的区别不在于科研经费的多少，而在于自主科研对于教学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的程度。研究型大学的教师的科研方向目标高远，在一批科学大师周围有一批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前沿的基础研究组成的团队，将高水平的和原创性的科研成果进入人才培养，学生在良好的科研环境中接受教育，得到最好的科研训练，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教学型大学的教师所从事的课题大都是一些实用技术研究，学生在实用技术研究环境中接受科研训练，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而高职院校教师更多地是对成熟的、已知的技术研究，并将最新的岗位技术和知识转化为课程，使学生围绕岗位需求学好和掌握技术。但不论是哪类大学，都必须将“用最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培养人才”放在首位。不同并不代表重要程度。按我国的高等教育分布，一所地方大学所需要承担的研究课题是很多的，许多地方发展的实际问题都需要大学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地方大学能否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马海泉：**能否担负这个责任的关键在教师，即人才问题。经过扩招后，地方高校教师的教学工作量相当重，顾不上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研究，同时，地方政府往往以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们都把眼睛盯着那些“211”、“985”高校，而忽略了本地高校的实力。

**赫冀成：**不可否认地方高校和“211”、“985”高校的差距。但水平是可以提升的，而且一些地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科研项目对于“211”、“985”高校的教师可能是看不上的，他们的积极性也不高，即使承担下来，也很难投入全力进行研究；但这些项目如果给地方院校，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他们会尽全力完成的。同时，对当地来说，这些地方大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学校发展的角度看，一方面，地方高校科研上不去，学校发展会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企业发展很快，技术更新换代很快，企业引进的技术都需要人才消化吸收。地方高校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马海泉：**大学必须通过解放思想，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给自由研究留出更多的空间，给教师教书和学生学习的“自由”留出更大的空间，保证科学研究和科学前沿的知识源源不断地进入课堂。现在的问题是大学科研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却长期少有人关注，有学校特色的课程开发和建设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丰富大学课程，才能为今后大学教学、科研和评价体制的深化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反映的困难，是许多问题交织的结果，带给大学的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 （三）大学科研与教学不是简单的“并重关系”，而是一种“耦合关系”

**赫冀成：**“科教融合”其实是大学校长们一直思考的根本问题，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理念。其中的根本性思想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推动、出成果的。怎么促进科研和教学的融合，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合促进它融合的体制保障；另外还要有一种机制，这个机制最重要的是学术评价体制。中国的学术评价体制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不讲科研成果怎么评价，在学校里面最重要的是对教师怎么评价，教师评价才是反映学校教学科研评价体系的根本。

对教师的评价第一要有教学工作量，哪怕你是院士。教师必须承担教学，否则不是大学。大学教授必须在培养学生上多做“功课”，让学生感受到名师的风采。同时，教师必须有学术水平。反映学术水平的标准是什么？目前，论文是反映学术水平最基本的手段，看论文不仅看是哪个层次，更要看论文里有多少创新点；专利也是反映教师学术成果的；另外，各种国家科技奖也是一种表现。评价科研不能看科研经费，经费只代表科研的成本，不是科研的水平。

**马海泉：**3年前，我在主持《中国高校科技》杂志工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要办好《中国高校科技》杂志，必须跳出“卡拉OK”式的办刊思想和理念，从科技研究的视角探索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从教育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视角去探索高校科技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高校科技工作的内涵。在科教分离的思想体系下，许多人看待《中国高校科技》杂志，首先想到的这是一本科研管理杂志，与大学教育、教学有什么关系？

3年来，我们终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教融合办刊理念，并在科教融合的理念下，重新审视了高等教育思想、理论、政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教师评价体制机制等问题，形成一批带有原创性的成果。

现在大学非常关注科研，但大学校长更纠结的还是人才培养。能不能用最新的科学知识培养人才，能不能为国家输送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校长们深感责任重大。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科研上不去肯定不行，但人才培养质量上不去更不行。教学科研的关系始终困扰着中国大学的发展和改革。但在科教“二分法”的思想引导下，要处理好科教关系基本是无解的。因为教学、科研作为大学最重要的两个子系统，其二者之间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并重关系”，而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耦合关系”。耦合（Coupling）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表现了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耦合性”作为系统结构中各个模块间相互紧密联系程度的一种度量。如果相互间的耦合性越强,它们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表明各个子系统的独立性越差;反之,如果相互间的耦合性越差,它们之间关系越松散,表明它们各自的独立性越强。从大学结构看,教学、科研之间的耦合性显然是极强的,用“耦合理论”研究大学教学科研关系也符合大学的实际。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影响人才培养,也影响到大学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影响到大学所面临的各种评价。依据耦合理论研究高等教育,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必须更多地强调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共性,结果使二者结合越来越紧密,并能形成共振,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科教融合理念下评价教师的教学学术能力,就可以实现直接评价教学(体现大学的育人本质)、间接评价科研(体现科学研究支撑引领高等教育)。

**赫冀成:**探索“科教融合”抓住了我国大学发展中的一个实质性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现阶段,新的理论呼之欲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通过“科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体系,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必经之路,是深层次的教育教学改革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是高水平大学成熟的标志。

(摘自:《科教融合》是高教改革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高校科技 2013 年第 11 期)

## 西南联合大学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之启示

### ——兼论南方科技大学探索之路

#### (一)

“西南联合大学”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个学校,先在长沙,然后在昆明联合组建的。从1938年5月到1946年5月,在八年战时期间,西南联大聚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培养了大批一流的人才。它是在“政府为使抗战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致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适应国家需要起见的情况下设立的,它在办学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其历史影响和意义可谓是深远和巨大的。深入研究和审视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和实践,能对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那么,在战时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取得那么高的办学成就呢,总体来说,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 1. 一流的师资

西南联大的主办者、三常委之一的梅贻琦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并坚定的认为“大学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是以吾人之图本校之发展,之图提高本校之学术地位也,亦以充实师资为第一义。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梅贻琦深知一流的师资之于大学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千方百计从各方聘请名师到联大来任教。八年期间,联大的教师经常维持在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占总数一半以上,共179人,这在当时的国内大学是绝无仅有的,它集中了当时国内主要学科的权威和领军人物。请看当年联大的豪华阵容:常务委员会委员有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傅斯年。教务长潘光旦等。总务长周炳琳等。文学院有胡适、冯友兰、杨振声等。中国文学系有朱自清、罗常培、闻一多、陈寅恪等。外国语文学系有叶公超、柳无忌、钱钟书、吴宓等。历史学系有雷海宗、傅斯年、吴晗、钱穆等。哲学心理学系有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在这179位教授当中,几乎汇聚了

当时中国学贯中西、汇通文理的大师级人物。据统计，在这些教授中间，曾有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联大3位常委中，2位留美，1位出洋考察过。5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2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当然，他们中间，也不乏没有留学经历、高学位的教授，比如沈从文只上过小学，华罗庚中学都没有毕业，钱穆也没有大学学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联大聘他们做教授。194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评选出院士81人，其中联大教授26人，占院士总数的32.1%。

## 2. “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一种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它最早源于欧洲中世纪“先生大学”代表的巴黎大学，该大学是由教师行会发展而来的，教师行会掌握着该大学的内部管理和外部事务的权利和利益。该大学通过全体教师组成“教授会”，学校管理权掌握在教授手中，他们负责课程的设立、教师的延聘、学生的遴选和其它一切行政工作，教师既是管理决策的主体，同时又承担着决策的执行与监督，而校长只行使“教授会”委托的一定权限。后来创建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德国的柏林大学将这一制度发扬光大，而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则对其赋予新的内涵。

在我国，“教授治校”的历史还不算太长，蔡元培于1917-1923年任北大校长期间，明确地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秉承“教授治校”的大学理念，逐步形成了以教授为主要管理者的评议会、教授会、行政会三级管理机构，开创了中国大学“教授治校”、民主办学之先河。随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将“教授治校”进一步从制度上加以完善，明确了清华大学教授会、评议会及校务会议的合法权利，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在此引领下，我国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的高等院校大都采用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秉承了“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联大组成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内部管理体制，它规定教授会由全校的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教学及研究事业改进和学风改进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及学位的授予；建议于评议会的事项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的事项；互评评议员等。教授会并不经常开会，但会主动过问校内发生的事务。教授会主要由校长召集和主持，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评议会是“教授治校”运行体制的核心部分，它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的评议员若干人组成。各院院长和教务长都由教授会中的教授推荐或聘任产生，所以，评议会实际上就是教授会的常务机构。其职权包括：议决大学的重要规章，审议学校预决算，议决学校基建及其它重要设备，决议学院、学系的设立或废止，议决选派留学生计划和经费分配方案，议决教授会和校长交议的事项等。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学校的法案、规章都由评议会提出建议并制订。校务会议则是学校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由校长主持、召集，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参加，其主要职责是议决学校一切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间的问题等。上述这一套办学制度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防止校长独断专权，也能够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政权对学校机构所进行的思想控制和渗透。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理念得以进一步贯彻深化。

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曾屡发训令，采用种种措施试图加强对联大的控制，如统一颁布大学科目表、统一课程、统一教材、实行毕业考试总考制等等。如1942年，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曾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之规定。这些做法引起联大教授的强烈反抗和抵制。联大对此专门召开了教授会，要求学校致函教育部转述教授们的意见。会上说：“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教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有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对此，行政当局只有作罢。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取得世界一流的

办学成果，和该校所秉承的“教授治校”的理念有很大关系。

### 3.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西南联大所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对于坚持学术自由，梅贻琦曾这样直言不讳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学术自由，包括两方面的自由：一之于教师，他们有教的自由；二之于学生，他们有学的自由。西南联大的必修课多由有名望的教授担任，选修课则由青年教师担任，但往往一门课由几位教师同时讲授，并不固定人选。如中国文学系的“楚辞”课，就是由闻一多、罗庸、游国恩、彭仲铎同时来讲授的，同一门课，各人讲课的角度却不一样。闻一多是从研究古代神话的角度讲授，罗庸从楚辞是诗经到五言、七言诗的过度的角度来讲的。又如中国通史，是西南联大各学院学生都要上的课程，这门课由吴晗、雷海宗和钱穆来讲授。吴晗用“纵法”来讲制度演变史，雷海宗用“横法”讲历史循环论，而钱穆则讲中国史大纲，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宣扬复古主义思想。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时间，既可以任意选听某一位教授的课，也可以同时选听几位教授的课。

学术自由的另一层涵义，即西南联大的教授可以存在和持有不同的政见与主张。当时的联大师生，可以说各党各派的都有。教授中，属于左派的有闻一多、曾昭抡，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费孝通，无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陈序经，属于国民党的有钱端升，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雷海宗，三青团的有姚从吾、陈雪屏……。教授们在党派之间虽然政见不通，但却都能做到在秉承学术自由的原则下，大家各不叨扰，相安无事。后来，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作家到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么差，教授和学生生活那么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认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这道出了联大办学成功的核心所在。

此外，西南联大还对学生实施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又称为通才教育。梅贻琦先生曾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兴民，而为扰民。”为实施通识教育，联大开设了灵活的选课制度，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联大的必修课大都开在一二年级，到三四年级绝大多数课程都是选修课，选修课的比重较大，一般要占到总学分的60%以上。据统计，联大八年共开出了1600多门课程。为了防止学生形成知识面太窄的情况，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学生要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和两门社会科学课程。而理工科学生要修较为丰富的人文社会课程，他们可以自由地和文科学生一起，共同聆听文科大师的教诲。在这样的氛围当中，联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知识丰富，视野开阔。

## (二)

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有必要借鉴和学习联大的办学精神和做法，探索我国高等教育新的发展方向。目前，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关注，再次唤起高等教育界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新一轮讨论。“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永远的痛，国人把希望寄托在新一轮的高考改革之上，南方科技大学能否实现它所提出的创办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的目标和梦想？曾经令国人感到无比荣耀和自豪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此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思考。

### 1. 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师资做保障

“名师出高徒”，“什么样的老师带什么样的徒弟”，这是古人所总结出来的显而易见的道理。西南联大曾汇聚了当时国内几乎各个领域的大师和学者，他们各怀绝技，才华

横溢，正是一流的师资为西南联大的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纵观世界一流高校，无不汇聚了大批名师于麾下。南方科技大学在师资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首先它通过遴选在全球公开招聘校长人选，最终，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院士全票通过，当选为南方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无论是学问、做人还是能力，可以说朱清时是不二的合适人选。其次，朱清时计划，无论是研究轨道上还是教学轨道上的师资，50%以上由海外引进。学校计划斥资百万年薪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相信此举会为该校的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

## 2. 去除大学“行政化”，推行“教授治校”制度

“教授治校”作为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在抗战期间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今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大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重提“教授治校”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新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就明确提出要采取“教授治校”的办学方式。校长朱清时曾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CEO”，大学的各种具体事务会交给教授会处理。然而，在当今中国，开展“教授治校”却显得并不那么容易。在朱清时校长看来，当前中国难有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官僚化，教授官员化”，是行政思维而不是教育规律在指挥与管理学校。因为行政化，很多年轻人不愿意钻研学问。指望走捷径。他认为教育有其特定的规律，教育必须由真正懂得教育客观规律的人来管，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办，这样才能办好。所以，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去行政化”的试验性。2008年，深圳市开始为南方科技大学挑选创校教育家，这场遴选之所以引起轰动，因为它通过海内外猎头公司，在全球“海选”出200多名校长候选人。众所周知，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是由上级任命，且不少来自行政官员。深圳的做法显示了一个办学理念：大学不是先盖大楼，而应该先引大师，要以校长招聘为核心，先确定校长，再会同校长招聘其他人才，在此，校长对人才的自主权力被前所未有的放大。深圳和朱清时的“野心”，就是要在南方科技大学里“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回归大学的本来面目——变行政主导为学术主导，由官员治校转为教授治校，以一系列的招生改革、院系设置、教研模式，打造一个精英化的科研型大学。朱清时表示：“大学‘去行政化’的本质是要由学术主导，而不是由行政权利来主导，由行政权利来主导就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由学术主导就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大家都服从真理，不分地位。”据悉，南方科技大学准备实行理事会治理制度，理事会成员将由教育部及省市政府成员、社会贤达和师生代表组成，负责大政方针制定，监督学校运作等，但是不会干涉学校的日常业务，朱清时本人带头除去“副部级”级别，这无疑是大胆的设想和创举。

而要真正做到“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在当今中国是何其艰难！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是广大知识分子的不懈追求。当前国内的教育体制高度行政化，致使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受到束缚，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剥夺，导致学校像工厂，学生像产品，千校一面，千生一面，学校缺乏生机和活力。更谈不上个性和创新。所以，当今政府部门需要转变观念，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给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让高校在不违背法律的轨道内，遵从教育规律办事，让学校、学生和教师都享有自主发展的权利，这样才能激发各个层面的积极性，取得较好的办学效果，

## 3. 学术至上，以人为本

学术和科研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大学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更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为此，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如何培养人、如何让学术得以更好的发展来进行。学术至上，以人为本应该成为高校的主要抓手。西南联大秉承“学术自由”的准则，深入贯彻通识教育，一切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无论是课程的设置和安排，还是教师的选用和调整，都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学生为出发点，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人才。梅贻琦认为，今日大学之师生关系，仍应如古人那样：“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即建立一种“游于圣人之间”

式的师生关系。而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我国高校老师整日为职称、生活所困，如何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成为许多人的共同追求，致使多数教授的精力放在了项目和成果上，教学质量严重滑坡，导致培养学生的水平大幅下降，而学术失范等一系列问题也不断涌现。以往所提倡的大学精神几乎被荡涤一空，大学不再是学术的殿堂，反而成了行政“衙门”，“学者官僚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为此，必须倡导重新回归大学理念，让大学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正像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大学“一是以探求真理、完善人格为宗旨；二是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条件；三是以教化社会、泽被人类为目标；四是以师生情趣相投、精神交往为形式。在此，南方科技大学也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不仅多方聘请名师，还准备开展书院式的教学管理模式，计划师生比例达到1: 6.8，让学生在与大师的对话当中，耳濡目染地受到熏陶。学校的一切都将围绕学生的发展这一中心工作运行。南方科技大学规定，学生入学后，头两年不分专业，由学校安排统一的理工科基础课数学和教育部要求的其他课程。大三开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每个学生会依托在一个研究所，在个性化的教学中完成专业学习和研究，学校将尝试自选教材，所有课程先采用中英文教学，然后逐步过渡到全英文教学，部分教材将采用国外原版教材。为了选拔到自己需要的学生，南科大将采用自主招生的模式，学生可以不参加高考，由高二直接选拔，自主招生将采取中学推荐和现场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较其它高校的招生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朱清时表示，要用几年的时间将学校建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把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和承认的一流人才，这种愿望能否实现尚未可知，但无疑是令人期待和鼓舞的。

（摘自：《西南联合大学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之启示》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2 年 28 卷第 2 期）